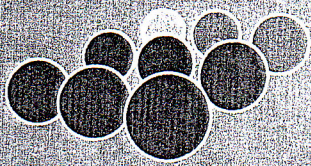


第1章 密度



在尘土飞扬，雷达几乎不能到达的西非平原上，一座容纳了160万人口的城市巍然矗立。尼日尔河从城中汨汨流过，将其分成两个城区，每个城区约有80万居民，河上仅有的两座桥梁维系着城区间的往来。这里人口流动极其频繁，每天早晨，其中一座桥梁专门为面包车、自行车、摩托车提供服务，偶尔也会有私人轿车通过。晚上，要离开市中心，人们不得不随着摩肩接踵的人群涌入公交车站。满载乘客的绿色篷车最远要驶入20公里开外的住宅区。这就是马里首都巴马科，早晨，它将人口吸纳到市中心，晚上又将其疏散出去。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巴马科市日渐扩张。它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人口自然增长、乡村移民和马里其他城市的移民等因素协同作用，致使2008年，巴马科的人口规模比10年前增加了50%，与布达佩斯、迪拜和华沙等城市不相上下。巴马科市的人口是马里第二大城市的10倍，马里70%的工业集团分布在这里。¹巴马科以南、以东、以西的一些乡村成为新的居民点，与城市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当前，为寻求便宜的土地或些许宁静，一些巴马科人正在移居郊区，然而，由于巴马科市可以为他们提供生计，他们依然居住在巴马科市辖区范围内。

巴马科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然而在西非，它仍然是个相对悠闲的城

市。许多制成品来自阿比让。阿比让是该地区的大都市，其人口数量是巴马科的二倍，距离巴马科1184公里。与拉各斯相比，巴马科不算大。拉各斯的活动非常集中，居民常常戏称他们生活在压力锅中。一些家庭提供6小时房间出租服务，然后租客会转移到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家庭。人们无须出门即可购买货物；拉各斯交通堵塞没完没了，人们步行或用手推车将货物送到陷于交通堵塞的司机手中。对某些人而言，正如拉各斯1980年总体规划的作者所言，该市的增长连绵不断，“无拘无束”²。其时，拉各斯的居民还只有250万。拉各斯交通堵塞，犯罪活动猖獗，然而移民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拉各斯，拉各斯的魅力究竟何在？

答案很简单：经济密度。拉各斯并不是世界上经济密度最高的城市，甚至也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经济密度最高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分别是伦敦市和孟买。然而，正如英国的经济与伦敦的增长交织在一起一样，尼日利亚的经济前景与拉各斯的增长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没有城市的生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国家日益繁盛，经济活动也就日趋集中到城镇、城市和大都市里。从客观的累计水平讲，经济活动的地理变迁如此自然，人们往往将其视为当然。而且，对于移民而言，靠近经济密度（城市）是一条脱贫途径，并将最终惠

及留守人口。著名城市化专家简·雅各布斯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都市经济如果运作得很好，贫困人口将会不断地发展成中产阶级，许多文盲将成为技术人口，许多移民将成为有所作为的公民。城市并不诱惑中产阶级，而是创造中产阶级。”³其时，简·雅各布斯并没有把巴马科和拉各斯放在心上。而如果她考虑了巴马科和拉各斯，她可能会这样续写：随着拉各斯和巴马科的增长，它们创造的中产阶级会填补西非的中产阶级空白。

本章介绍密度。密度即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或经济产出，是发展的第一位地理特征。关于密度与发展演变进程的研究揭示了一国的密度随城市化加强而变化的典型事实，即速度由快而慢。这些变化最初与具有经济密度的地区和不具有经济密度的地区的生活水准的地区差别息息相关，接着又与地区趋同联系在一起。最终，不同地区，例如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水准趋同。甚至在城市内部，正规居民区和人口密集的贫民窟的差异也会在发展的进程中逐渐销声匿迹。然而趋同不会自动发生，它要求政策机构合理规范土地市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对其进行适时切实的干预和调整。

主要有如下发现：

- 发展促使经济活动日趋集中。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地区或居住区分布在发达国家。然而通向这一水平的途径，即本报告所指的“城市化”，并非一帆风顺。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城镇人口比例迅速攀升，并伴随着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变。之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减缓，但由于服务业的密度更高，在后工业化经济中，经济密度仍将持续发展提高。

- 发展缩小了城乡和城市内部的

福利差距。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福利水平的地区差距巨大。在发展进程中，这些差距起初可能增加。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生活水准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趋同。在社会服务便利的地区，在增长更为活跃的地区，趋同的速度更快。在很长的时间内，城市内部的福利差距和住房差距（非正规居住区或贫民窟的差距最为明显）将持续下去，只有在发展的后期才会缩减。

- 城市化进程及其与经济生长的联系并非史无前例。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沿着发达国家绘制的路线航行，涌入城镇的速度差可比拟，路线一般无二。二者的区别在于航船的规模：当今发展中国家每年涌入城镇的人口绝对数甚至远远大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最新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本报告后面的章节将对这些相似点和差异点的政策启示展开调查。

密度定义

密度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或者说每单位土地经济活动的地理密度。它是每单位土地经济产出水平及收入的记录。例如，我们可以用每平方公里土地的增加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来测量密度。鉴于高密度要求劳动力和资本的地理集中，密度因而与就业和人口密度联系密切。密度是城市居住区的定义性特征。

经济世界并不平衡

无论如何测量，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都不平衡。无论密度测量的地理单位是国家，还是国家的省或区等辖区，密度都表现出等级性特征。主要城市高居榜首，农业地区或乡村地区处于底部，其间是不同密度居住区的连续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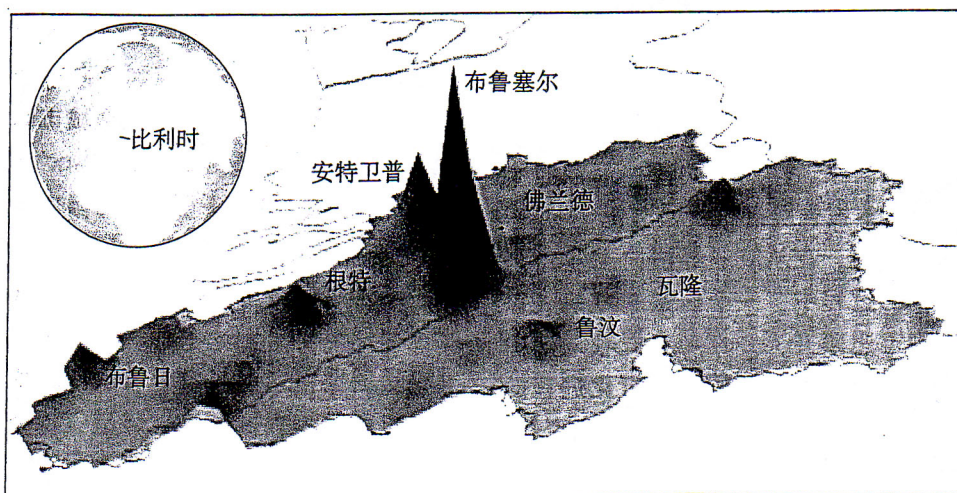
经济总量的地理不平衡，或者说波动性，随国家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即使小国的地理经济也会波动起伏。比利时城市布鲁塞尔的土地面积约为 161 平方公里，其中 15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为非农业用地。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35 万工人生产出高达 550 亿欧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 2 000 多名工人每年生产将近 3.5 亿欧元的服务或商品。布鲁塞尔不仅拥有很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密度和就业密度，而且也是欧洲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被划归为 NUTS1（标准地区统计单元目录），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过 6 000 人，为比利时平均数字的 18 倍。⁴ 比较一下，伦敦和马德里的人口密度大概是每平方公里 5 000 人。

这一密度与比利时农业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佛兰德地区，6 323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其面积几乎是布鲁塞尔的 40 倍，然而其就业率仅是布鲁塞尔的 13%，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布鲁塞尔的 4.5%，转换为就业密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密度即每平方公里中 7 位工人生产 33 万欧元的产

品。布鲁塞尔和佛兰德地区的产出密度比率为 1 000:1。在大都市布鲁塞尔和佛兰德乡村地区之间是一系列密度各不相同的居住区。安特卫普、布鲁日、根特和鲁汶等城市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产出为 2 200 万欧元，就业密度为 342 名工人。⁵

这样，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走势都呈现高低起伏的态势（参见地图 1.1），但其态势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城乡间的相应对分。在一组密度序列地区中，一国首要的、一级的，或最大的城市名列榜首。一级城市与其下面的二级城市、小城市中心、镇和村等组成了居住谱系。在一些国家，第一和第二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非常显著，例如法国和墨西哥就是这样。巴黎人口为 1 000 万，这使得只有 150 万人口的二级城市马赛相形见绌。墨西哥市有 2 200 万居民，其人口密度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市的 5 倍还多。恰恰相反，在印度和美国，两个最大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相对较小。孟买和新德里的人口数量旗鼓相当，均超过 2 200 万。洛杉矶约有 1 800 万人口，纽约市则

地图 1.1 即使在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经济板块走势也波动起伏



出处：2009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和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基于对 2005 年比利时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估测。同时参阅 Nordhaus 2006。

有 2 200 万人口。^{6, 7}

地区组合方式的演进

尽管表面上，城市的增长杂乱无序，但其潜在的模式却有着显著的秩序（参见图 1.2）。一国的城市等级有两个特征，即其遵守两个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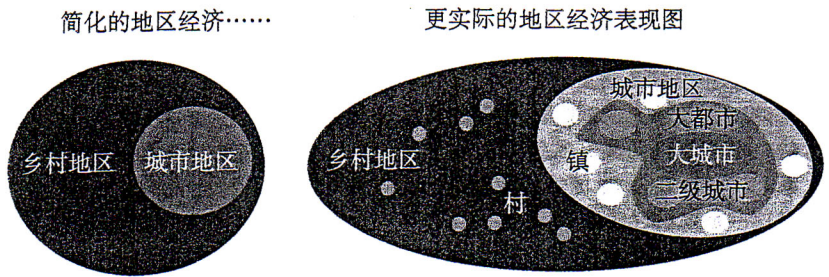
- 城市位序-规模法则：城市在位序塔上的地位和该市与最大城市之间的人口对比呈负相关关系。

- 吉伯特法则：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不受其规模的制约。

根据城市位序-规模法则的特例，即齐夫法则，任何城市的人口都与最大城市的人口一样，根据该城市在国家城市位序塔中的地位归类（参见专栏 1.1）。⁸早在 1682 年，Alexandre Le Maitre 就观察到法国城市规模的系统模式。⁹对国内任一位序的城市而言，相对规模分布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稳定状态，即使在收入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参见图 1.2）。尽管人们注重“城市优先”，“地方组合”仍是经济发展经久不息、不容抹杀的特征。

规模各异的居住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大都市、二级城市、市镇和

图 1.1 地区组合方式从二分到连续体的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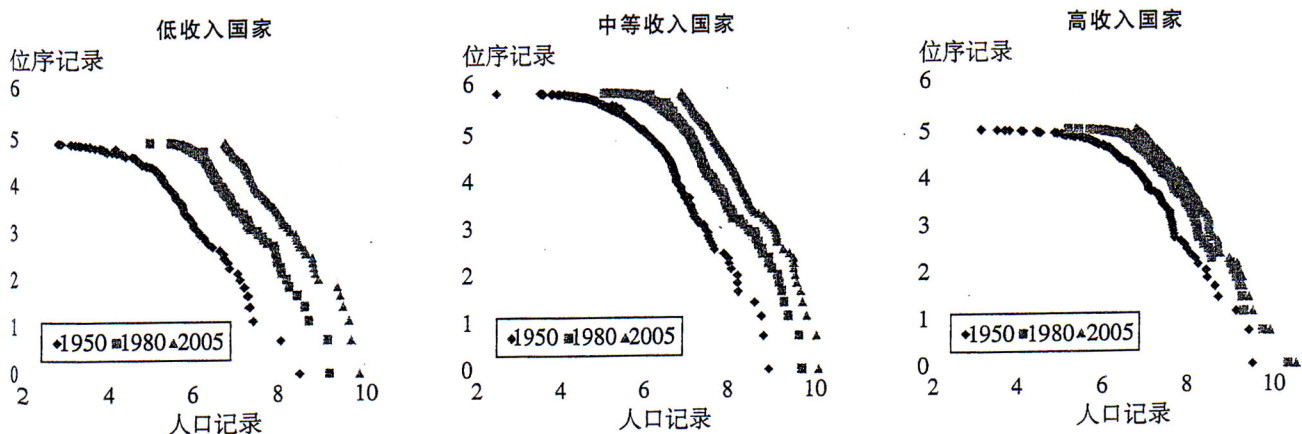


出处：2009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村庄因其互补功能而联结起来（参见专栏 1.2）。一级城市常常是国家的行政中心，政治力量所在地，当然也有例外，如柬埔寨的金边，喀麦隆的雅温德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一国主要城市的多元化特征往往也最为显著，这不仅表现在货物和服务的供应上，也体现在文化和其他福利设施上。提及文化设施的多元化特征，人们应该想到纽约的百老汇，悉尼歌剧院和巴黎的卢浮宫，但人们也应该想想西班牙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港口一年一度久负盛名的狂欢节吸引了大量的观光游客。

正如主要城市构成一国都市地区及其毗邻城市的核心一样，其他大城

图 1.2 居住区的相对规模分布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出处：联合国 2006c。

注：每一个数据点代表一个人口规模为 750 000 人或超过 750 000 人的聚集区域。

专栏 1.1 两个法则和规则：一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经验规律

位序-规模规则发现于1913年，它可以表述为：一个规模为 s 的城市，它的位序 r 与其规模 s 成负幂次方的关系。该幂次方为 -1 的特例被称为齐夫定律，是以语言学家乔治·齐夫的名字来命名的。位序-规模规则的普遍适用性，不仅为不同国家大城市中不同收入阶层所证实，也为个别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在美国，尽管城市位序塔西向和南向扩张举世瞩目，该规则详尽描述了美国1790年至1950年期间每十年的城市规模分布。^a 的确，即使在今天，位序-规模规则依然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的规模分布（参见专栏数据）。尽管如同许多国家的现实状况所示，随着时间的流逝，该规则的外在表现稍微趋向平直，美国的城市规模整体分布也更加

平衡，该定律对于美国城市-规模分布中的一些极端情况并不成立，这一点，对于许多国家也同样如此。^b 而且，位序-规模规则同样适用于哈萨克斯坦和摩洛哥等截然不同的国家，进一步证明了该规则的普遍实用性（参见专栏数据）。

位序-规模规则是否具有基本的理论结构，真正堪称规则，这仍在商榷中。吉伯特法则意味着城市增长的齐头并进，从中可以看到位序-规模规则的痕迹。^c 这与城市间的任何系统性增长差异协调一致，并行不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无力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绩效。城市能够，而且也确实因政策选择的优劣而沿着国家城市位序塔上下浮动。城市的发展即使瞬息背离平行增长路径，都将对城市居民的福利产生长期

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位序-规模法则是否如同齐夫法则所言，其乘方等于 -1 ，许多研究者似乎认为一般而言，该值并不等于 -1 。

关于位序-规模的完全信息为，对既定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各种规模的城市并存不悖。即使在最发达国家中，也存在着一组规模由小而大的居住区，这与某一单调的大城市或者一组规模相似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集聚是向心力和离心力互相平衡的结果，平衡点则因部门、经济活动和工业种类而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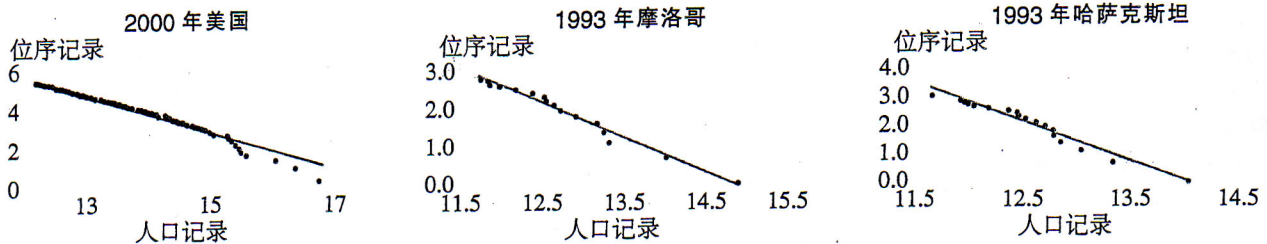
出处：Mark Roberts 提供。

注：a. Madden 1956, 引自 Kim 和 Margo 2004。

b. Gabaix 和 Ioannides 2004, p. 14。

c. Gabaix 和 Ioannides 2004, pp. 16-17。

位序-规模规则适用于美国、哈萨克斯坦和摩洛哥等环境迥异的国家



出处：关于美国的图摘自 Rose (2005)，关于哈萨克斯坦和摩洛哥的图以 Brakman, Garretson 和 Marrewijk (2001) 的城市和都市集聚数据为基准。

市中心或二级城市也构成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心。例如，他们是当地的金融中心，为周边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杜塞尔多夫、汉堡、汉诺威和慕尼黑都是当地的证券交易中心和风险资本公司的集中地。¹⁰ 达拉斯和亚特兰大一跃为美国南部低地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联邦储备银行地区办事处的所在地。¹¹ 大都会中心和二级城市还发挥着地方政治中心的作用，提供先进的公共卫生、教育和文化设施。安得拉邦的首府海德拉巴拥有的大学不计其数，其技术教育学院和私立医学院遥遥领先，堪称印度南部的学术

活动中心。

地区的大城市和小城市及主要市镇联系密切。德国的鲁尔区，荷兰的Randstadt城市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巴东-棉兰中心，体现了城市间的联盟关系。这些地区的小城市构成了更为专业化的城市中心，重视制造业及传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的生产。共生共荣就是统率一切的秩序：大城市有助于小城市的发展，反之亦然。例如，小城市以通勤的方式为大城市供应劳动力。¹²

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同样存在于小城市 and 市镇之间，

专栏 1.2 韩国的地方组合

韩国城市位序塔中的7个城市，即首尔、釜山、大邱市、安山、龟尾、井邑和淳昌，可以阐明韩国地方组合的发展样式。

首尔是位序塔的顶峰，位于韩国和朝鲜汉江盆地交界50公里处。首尔是韩国的首都，韩国1/4（即976万人口）的人口居住在首尔。首尔是韩国的政治中心，文化心脏。首尔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的专业化也具有代表性。此外，首尔的出版印刷业、时装设计和高档服装产业专业化程度也很高，首尔46.5万制造业工人中，一半以上在这两个行业中就业。

其次是釜山和大邱市。釜山拥有370万居民，是韩国的第二大城市。釜山位于朝鲜半岛东南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城市之一，每年接待的集装箱超过650万只。大邱市是个拥有250万人口的大城市区域，纺织业、服装制造业、汽车零件制造和装配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自1970年以来，京釜高速公路将釜山和首尔连接起来，而大邱市正是该公路的中间站。首尔和大邱市之间的航班每天约有20架次，自2001年以来，首尔和大邱市之间的高速铁路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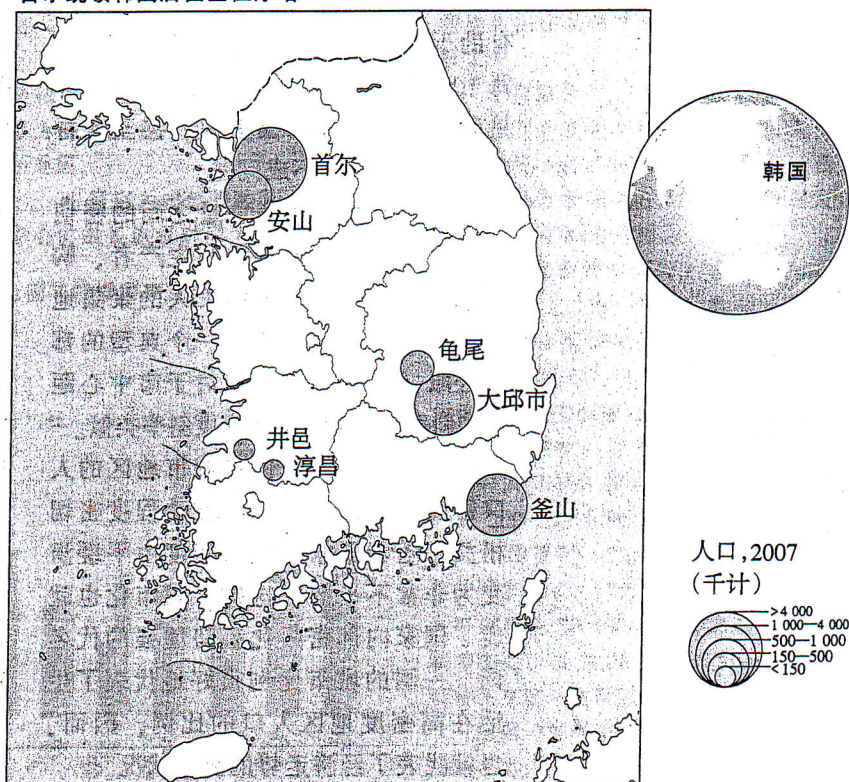
沿着位序塔再往下，安山和龟尾是二级城市，人口数量分别为679 000人和375 000人左右。安山位于京畿道，属于国家首都首尔地区，是首尔郊区的一部分。龟尾位于东南部的庆尚北道。较之于位序较高的城市，安山和龟尾的专业化制造业，尤其是标准化制造业比较发达，事实上，二级

城市就是这样。两个城市均为制造业中心，但它们制造业专业化却各有千秋。龟尾的收音机、电视机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高度专业化，超过半数的制造业工人在这些行业就业。安山的电子机械、电脑和办公用机器等高科技工业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且，它的几类重工业生产也比较集中：将近14 000名工人，即14.7%的地方制造业劳动力在合成金属制品工业中就业。

位序塔的最低层是井邑和淳昌，二者均属于全罗北道，介乎乡村和城市之间。因此，尽管井邑人口较多（129 050人），但1/4的居民是农民。同样，淳昌是个乡村小镇，32 012名居民中，半数是农民。如果它们有专业化制造业，则或者是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如井邑），或者是食品饮料制造业（如淳昌）。

出处：Park 提供。

首尔统领韩国居住区位序塔



出处：2009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数据来自韩国统计部门。

市镇和农村地区之间。市镇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为农业和农村的经济产出提供交易中心，促进农村非农经济活动的发展，为农民提供季节性工作机会，促进高等教育和健康卫生服务的规模经济化。这里，共生共荣法则显现威力。乡村地区的农业活动支持

市镇的发展，而通过非农就业机会，市镇的繁荣也渗向农村。越南农民季节性移民到城市从事建筑工作，赚取的收入投入他们的农场。¹³ 肯尼亚东部 Makueni 地区农民将非农收入用于整修梯田，植树造林，清理灌木林，建造房屋和子女教育。塞内加尔半干

旱区迪乌贝尔的农民顺应城市肉类需求的增长，从落花生种植业转向家禽养殖业。¹⁴

密度的测量

将生产总值测量精确到空间层次，例如精确到某地区或某城市，殊非易事。即使在发达国家，产出测量也只是在国家界定的区域开展，而这只是大致的范围（第一层次和行政区划，如省或州）。在该层次上，经济密度的重要变量可能趋于平均化。然而，如同之前关于比利时的阐述所示，产出和人口密度息息相关，不可分割，这有助于解决该问题。由于大多数国家每 10 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因此更容易获得可信的人口测量值，甚至乡村或镇的测量值也不成问题。

人口密度和经济总量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城市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购买者和销售者、公司和工人的聚集地协调一致，并行不悖。一个典型的都市区域，其人口密度相对于市中心距离的斜率和相应的就业密度斜率类似。¹⁵ 如上所述，一国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其经济走势的波动程度密切相关。随着国家发展，密度由平缓演变为非常不平衡。这样，城市化也就成了国家内部密集化趋势增强的代名词。一国的城市比例很好地代表了生活在高密度地区人口的比例，因而，也就代表了经济走势的波动状况。

本报告建议采用根据地理信息系统计算的集聚指数测量密度。然而，不同国家的测量方法可能各不相同，这给数据比较和累计带来很大的困难。该指数允许对国家间的城市化水平（或者替换为集聚密度，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度）进行连续一致的比较。

如果满足下述三个条件，该指数将认定某一平方公里地区为城市、集聚或密集区。

- 其人口密度超越某一界线（150 人每平方公里）
- 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城市（公路交通 60 分钟）
- 该城市规模大，满足人口规定（居民超过 5 万）。

专栏 1.3 概述了集聚指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总结。

将地区密度和地区与大城市的距离融合起来，这是集聚指数的优势之一。该指数建立在人口密度和大市场可及性标准的基础上，更有可能提出既受益于又促进集聚经济的地区经济定义。经济密度与集聚经济互为因果，尽管如此，利用城市周边地区的经济板块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挖掘这种优势。对需要当面接触的服务业而言，尤其如此。通过减少城市中心及其近郊用于居住的宝贵用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的密集化。

发达国家居民开车或搭载高速公路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与发展中国家同等地位的居民比较，这是他们独享的奢侈。发展中国家依靠步行、骑自行车或在条件恶劣公路上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等有限的、浪费时间的交通方式，因此，对任何给定的距离，其城市可达性都比较低。在印度孟买，44% 的人口步行去上班¹⁶，而在中国的合肥市，超过 70% 的人口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¹⁷

可达性的差异决定着城市的模式与形态。在大多数人需要步行上班的情况下，城市的人口更可能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在孟买，半数工人居住在 2 公里以内，这意味着他们距离工作单位很近。同样，为取得工业区的集聚优势，19 世纪的英国工人也不得不居住在距离单位不远的地方。工业城镇的中心人口密集，房屋拥挤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直到电车投入运营，该状况才得以改观。

专栏 1.3 计算集聚指数

联合国维持的“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库，作为信息宝库，它弥足珍贵。它提供 229 个国家的城市比例和人口数据，并上溯到 1950 年。这些数据以国家定义为基础，而不同国家的定义可能大相径庭。本报告以“城市”或聚居区域的统一定义为基础，提出了聚集区新的测量方法。这里，统一定义采用 Chomitz, Buys, De Luca, Thomas 和 Wertz-Kanounnikoff (2007) 提出的并由 Uchida 和 Nelson (2008) 详述的技术。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世界城市化数据存在瑕疵。同等看待测量城市化程度和测量贫困程度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任何一国都使用自己的贫困线和贫困标准来追踪国家贫困率的变化。但是这些测量结果并不能用于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程度，亦不能用于国家组别的贫困累

计。采用统一的贫困标准，如根据国家购买力差别调整的每天 1 美元或每天 2 美元贫困线，允许在国际上比较贫困程度和累计计算世界或地区的贫困程度。同样，集聚指数使类似的比较和计算切实可行。

支持集聚指数计算的方法论基础简述如下：

- 明确起点。根据集聚指数，一个地区如果想划归为“城市”，就必须满足三个标准，这些标准基于：(1) 界定大城市的最小人口规模；(2) 最小人口密度；(3) 通过公路到达大城市的最长旅途时间。

- 确定大城市的中心位置。采用全球城乡地图规划人居数据库 a 的数据为满足最小人口规模标准的城市绘制地图。

- 确定大城市的边界。以到达市中心的 longest 旅程时间为基础计算大城

市中心的边界。测量旅程时间时采用了成本—距离模式。该模式利用运输网的地理信息体系数据，越野路程采纳陆上数据。

- 创建人口密度坐标图。采用全球城乡绘制计划和 LandScanb 全球人口数据坐标图创建 1 公里空间解析坐标图。

- 确定地区。确定符合上述三个标准要求的坐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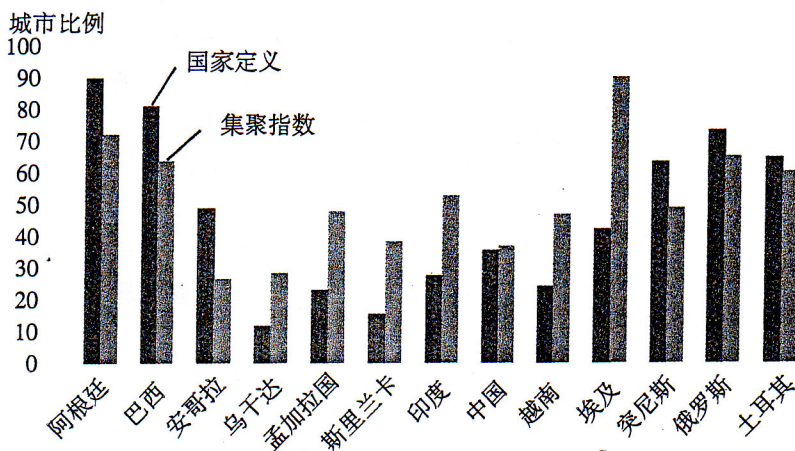
- 累计坐标点的人口数量。结果与城市人口类似。该人口数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为集聚指数，这是测量居住在高密度地区人口比例的简单方法。

计算指数时，本报告采用的基本案例符合下述基本特征：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最小起点为 50 000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50 人，到达最近大城市的时间为 60 分钟。

密度和旅程时间即 Chomitz, Buys 和 Thomas (2005) 采用的数据，密度起点即经合组织使用的数据。50 000 人作为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最小起点，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而言，都不失合理性。许多发展中国家超过 10% 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为 50 000 人到 200 000 人的城市地区。例如，2002 年的智利、2000 年的巴西及 2000 年的马来西亚，17% 左右的居民居住在人口规模为 50 000 人至 200 000 人的城市中心；而 2001 年，20% 的印度人口居住在这一规模的城市中。

根据“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库，2000 年世界的城市比例为 47%。使用基准实例标准为 52%，而依照集聚指数，将最小人口规模设定为 10 万人，则该比率为 44%。而国家层次的测量可以进一步分解（参见专栏数据）。

可用于国家间比较的集聚指数得出的城市比例与根据国家定义计算出的比例不同



出处: Chomitz, Buys 和 Thomas 2005; Nelson 2008; Satterthwaite 2007; 联合国 2006c。

注: a. GRUMP 人居数据库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中心运作，网址为：

<http://sedac.ciesin.columbia.edu/gpw/index.jsp>。

b. LandScan 由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运作，网址为：<http://www.ornl.gov/sci/landscan/>。

自然地理特征决定进入城市的途径，并进而决定城市的模式和形态，因此，自然地理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仅仅因为地理因素，纽约市的曼哈顿

岛来往困难，因此，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其中心集聚结构堪称典范，半数就业人员居住在华尔街周边三英里以内。这与洛杉矶的情况截然不同。为

寻求更多的就业人员，¹⁸ 洛杉矶的城区延伸到 11 英里开外。也就是说，纽约市的经济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4.4 亿总产值，洛杉矶仅为 4.9 亿。¹⁹

在英国，为伦敦服务的通勤小镇有斯蒂夫内齐、巴西尔登和克劳莱。郊区通勤者生产的产品约为伦敦生产总值的 11%。²⁰ 美国也有类似情况，每天，通勤者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等邻州涌入华盛顿特区。2005 年，这两州通勤者对华盛顿特区产出的净贡献为 364 亿。由于通勤方便，单是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对华盛顿总产值的贡献就高达 64 亿元。²¹

集聚指数使国家间比较成为可能，这是其最大优势所在。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库包含“使用各国或各地区自定标准划定的实际城市人口”数据，因而，比较而言，集聚指数更具优势。²² 国家间存在的异质性会误导国家间的比较结果。兹举例如下：

- 印度。根据赞比亚或沙特阿拉伯的城市划分标准，即人口 5 000 人或 5 000 人以上的居住区为城市地区，1991 年印度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为 39%，而不是 26% 这一官方数据。这是因为根据上述标准，13 376 个村庄的 1.13 亿居民将被重新划归为城市人口。

- 墨西哥。根据墨西哥官方标准，即居民人口为 2 500 人及以上的地区为城市地区，其城市比例为 74.4%。如果居住人口标准重新界定为 15 000 人（例如，尼日利亚和叙利亚的界点为 20 000 人），其城市比例将降至 67%。

- 毛里求斯。2000 年，大约 1/4 的毛里求斯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为 5 000 人到 20 000 人的地区。其中一些地区是地方首府，然而，任何一个都没有划归为城市。倘使这些地区被划归为城市，毛里求斯的城市比例

将由原来的不足 1/2 增至 2/3 以上。

在地区层次上，根据“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南亚不仅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比例为 27%）最低的区域，也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这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根据集聚指数可知，2000 年南亚的城市比例为 42%，其城市化水平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东亚太平洋地区（参见图 1.3）。“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库也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带来了类似的困扰。2000 年，该地区的城市比例超过东欧和中亚，几呈与经合组织国家分庭抗礼之势。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拉丁美洲国家的 6 倍还多。集聚指数表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00 年的城市比例与东欧和中亚的水平大体相当，比经合组织国家低 15 个百分点，这更为切实合理。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却是进行跨时期比较的唯一可利用的数据。由于测量行程时间所必需的公路网络时间序列数据缺位，集聚指数只能上溯到 2000 年。因此，在测量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密度时，应该将“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库的数据列为集聚指数的补充数据源并予以考虑，本报告同时使用集聚指数和“世界城市化前景”数据。²³ 这至少使对一些国家的已往城市比例测量值进行比较计算成为可能，而且这应当成为所有国家优先开展的工作。

经济集中——愈是富裕，密度愈高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分散居住在农村。即使最大的城镇规模都不大。城市居住区可能是个较小的港口城市或市镇，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提供交换剩余农产品的交易市场。工业化带来了迅速的

城市化：新的城市兴起，已有的城市进一步扩张。由于人们涌入城市的速度高于城市扩张的速度，人口和城市密度的提高也就在所难免。在一个国家的早期发展中，这形成了完备的地区等级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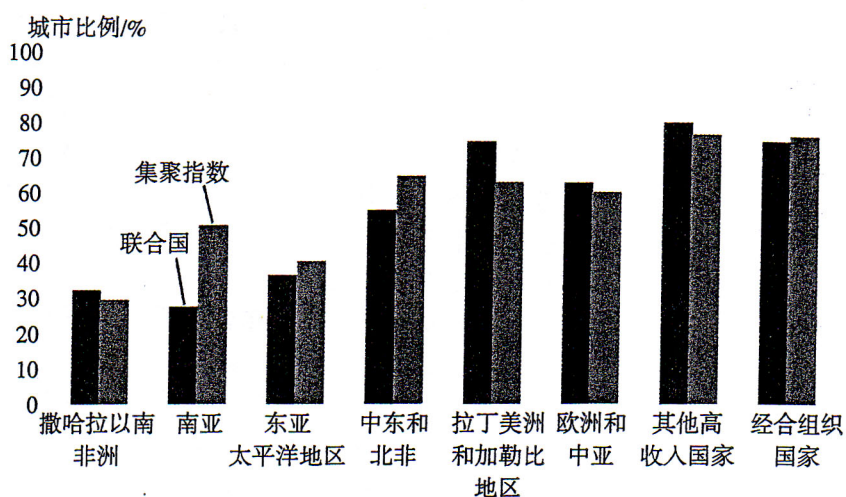
这样，两个基本转变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特征。从农业经济为主演变为制造业导向型经济，这是第一个基本转变。传统上，人们认为第二个转变发生在发展的高级阶段，涉及向服务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第一阶段，速度较快，伴随着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第二阶段，速度较慢，是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城市内部的演进息息相关。在大多数国家，这些转变在不同地区同时展开。

为测量集中程度，我们必须对地区加以界定。政策争论常常涉及城市优先的讨论，诸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等等。学术性更强的讨论采用纯地理空间的概念。本章同时采纳两个空间单位，即主要城市和一国坐标图上每1经度和每1纬度之间的密度最高区来测量集中程度。

集中的历史轨迹：从迅速趋向平稳

某定义规定，城市是一个地理区域，是经济活动行为者的集聚地。²⁴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世界前30位城市，其2005年总产出约为世界总产出的16%，而前100位城市的总产出则将近25%。东京城市聚集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加拿大的总产出，纽约则相当于西班牙，伦敦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瑞典和瑞士。同样，发展中国家主要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异乎寻常。2005年，墨西哥市对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0%，然而其面积仅为国家面积的0.1%。罗安达对安哥拉

图 1.3 集聚指数有助于比较区域间的城市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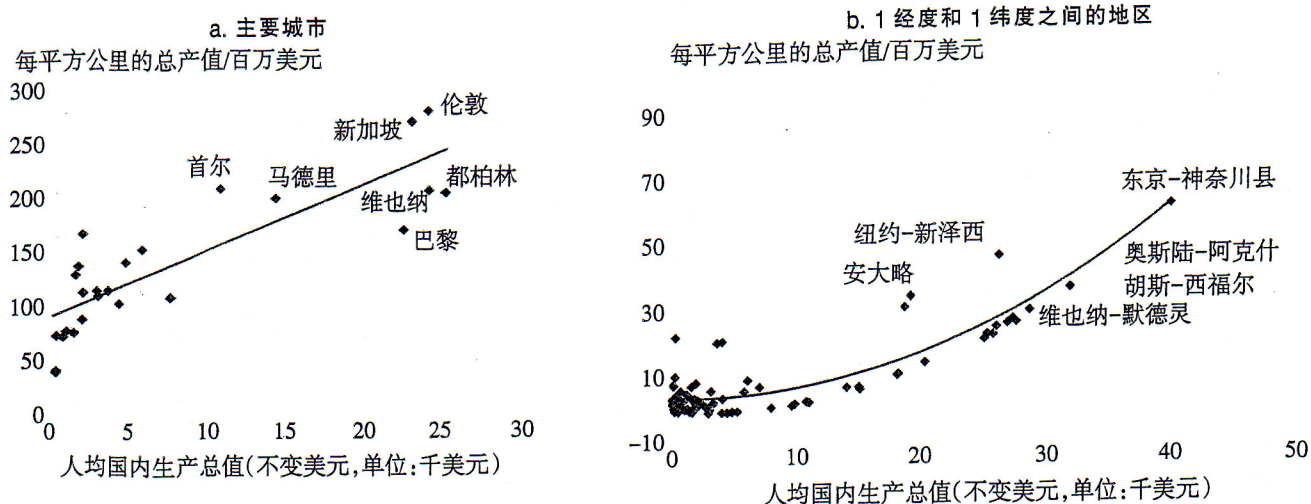
出处：Chomitz, Buys 和 Thomas 2005; Nelson 2007; Satterthwaite 2007; 联合国 2006c。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与之相当，其面积同样微乎其微（仅为国家面积的0.2%）。同样，匈牙利、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最大的城市（布达佩斯、内罗毕、卡萨布兰卡、拉各斯和利雅德），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为20%，然而其面积均不足国土面积的1%。²⁵

密度指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每平方公里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密度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地区分布在最富裕的国家。就城市而言，2005年，都柏林、伦敦、巴黎、新加坡和维也纳名列前茅，每平方公里土地的生产总值超过2亿美元。就地区而言，东京-神奈川县、纽约-新泽西、奥斯陆-阿克什胡斯、维也纳-默德灵是坐标图上每1经度和每1纬度之间的密度最高区，每平方公里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万美元（参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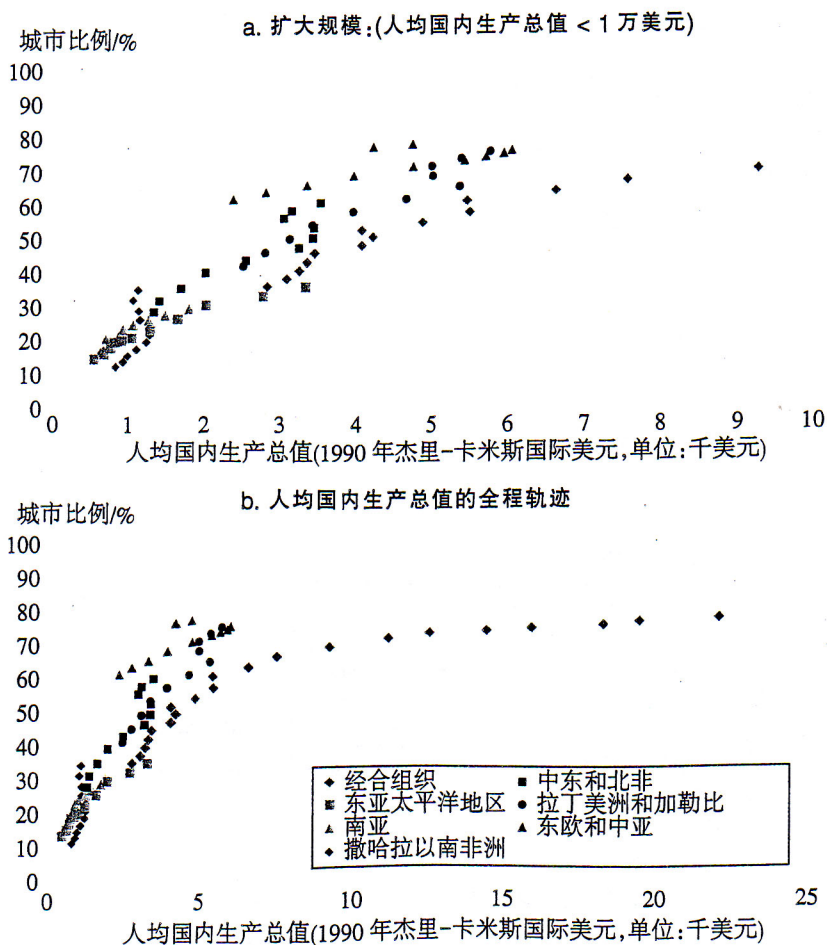
对一个世纪内城市比例累积数据和两个世纪内主要城市人口调查记录的研究表明，在起始阶段，城市化进展迅速，之后趋于平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城市比例迅速攀升的阶段。一个世

图 1.4 国家愈是富裕，经济总量愈是集中



出处: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银行 (2007) 数据的估测, 数据库网址为: www.citymayor.com 和 www.gecon.yale.edu。

图 1.5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类似于先期发展者的发展轨迹



出处: Maddison 2006; 联合国 1969; 联合国 1949; 联合国 1952; 世界环境历史数据库; 联合国 2006c。

纪之前经历该发展阶段的欧洲和北美
人, 已经忘却了这一点, 这似乎可以
理解。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则为理解地
理集中的速度和模式提供了最好的研
究案例。它们的发展轨迹接近于当今
世界最富裕国家的渐进式增长模式。

根据居住在城市地区人口比例的
累计数量, 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
美洲过去 50 年的城市化模式和经合组
织国家 1900—2000 年期间第一阶段的
城市化模式极为相似 (参见图 1.5)。
亚洲的城市化进程折射出 19 世纪经合
组织国家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欧和中亚、
中东和北非的地理变迁和经合组织国
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经历在性质上大
同小异。根据收入数量的比较, 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欧和中亚地区
的城市比例要高于经合组织国家。

然而, 这可能是人为编造的数据。
仅仅由于定义的偏差, “世界城市化
前景” 数据库的数据整体上夸大了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东欧、中亚和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城市比例。最谨慎
的结论可能是, 城市化模式, 即经济
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 并非史无前例

专栏 1.4 非洲城市化进程反映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1970—1995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城市人口以每年5.2%的速度增长，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以每年0.66%的速度下降。自Fay和Opal的作品公诸于世后，考虑到非洲的状况，许多人认为城市化并不一定与发展并行不悖。但是，萨特斯维特(2007)对大多数关于城市人口数量研究的效度提出了质疑。由于许多研究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研究可能严重夸大了城市人口的数量。

问题在于缺少经常的人口普查。乍得和厄立特里亚1950—2030年期间的人口预测建立在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刚果(金)的人口预测来自两次观测，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84年。据此，只有那些1970—1995年期间至少进行过两次人口普查，为得到更准

确的人口预测2000年后开展过人口普查，1995年其人口至少达到100万的国家，和1970—1995年期间的部门附加值数据才能予以考虑。

由此，实例缩减为贝宁、博茨瓦纳、中非共和国、加纳、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10个国家。这10个国家中，5个国家有过至少一次冲突，另外5个国家在此期间处于和平状态。这两组国家并没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主要发现如下：

- 除博茨瓦纳外，这些国家的人口平均翻了一番，但累计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60%。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总增加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 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总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总体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翻了一番)，其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最快(增加了4倍)。在这些国家中，贝宁和津巴布韦处于领先地位。

- 城市化速度与工业、服务业等城市地区主导产业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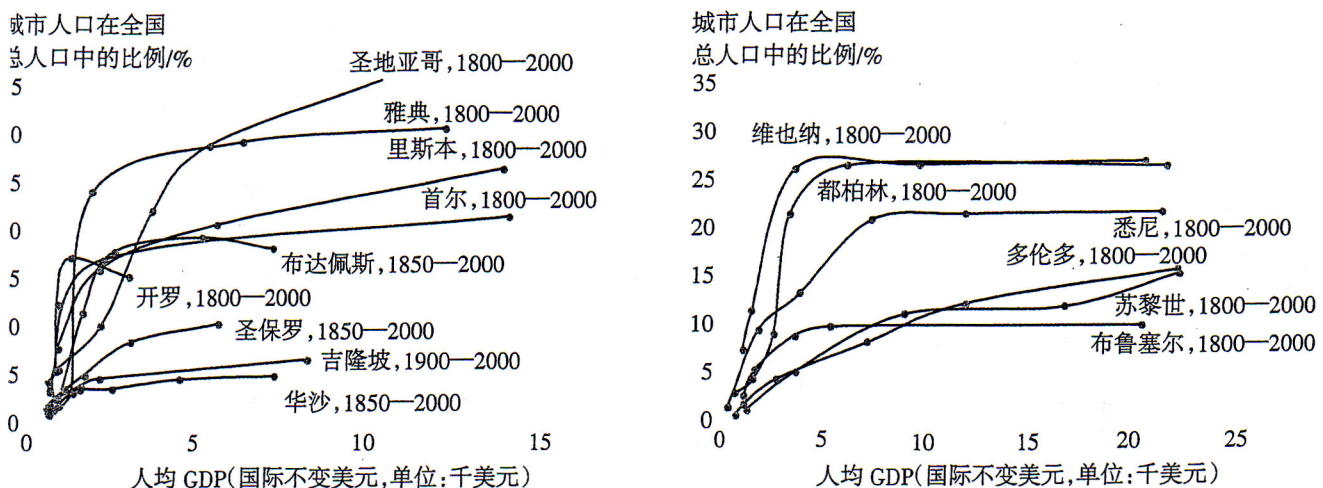
这些模式并不支持非洲国家城市化进程无增长这一观点。恰恰相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的国家，其城市化进程也较快，城市化与工业、服务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反之，非洲若不推进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将放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将增大，贫困现象也将继续蔓延。

出处：Fay和Opal 2005；萨特斯维特 2007；联合国 2006c。

的独创。即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升反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70—1995年的迅速城市化都伴随着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城市化与工业、服务业的迅速增长携手并进，相得益彰(参见专栏1.4)。

从分解的层次看，一国主要城市的人口比例形成了性质相同的非直线模式，即起初迅速集中，然后趋于平缓(参见图1.6)。从布达佩斯、开罗、吉隆坡和華沙到雅典、里斯本、圣地亚哥和汉城，为寻求多元化收入，经

图 1.6 城市化早期阶段，密度迅速增加，接着趋于平缓



出处：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工作小组城市人口数据库，人居工作组，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数据作出的估测；1950年至今的数据主要摘自联合国(2006)，1950年之前的数据主要摘自Chandler和Fox(1974)，Chandler和Fox(1974)，Chandler(1987)，以及Showers(1979)；拉丁美洲数据还从对194个已公布人口普查的回顾中抽取。

济活动集中在国家最大的城市中。这些演进也精确地勾勒出了布鲁塞尔、都柏林、悉尼、多伦多、维也纳和苏黎世自1800年以来两个世纪的城市化轨迹。

今天，城市化进程同样由迅速趋向平缓

现在，一国发展水平和集聚密度的比较再次呈现为类似的模式。2000年至2005年期间，低收入国家的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比中等收入国家高出1.3%，比高收入国家高出0.9%。这种关系稳定。它包括了从集聚指数到人口、总产值和家庭消费密度等一系列集中标准。它覆盖了不同规模的地理层次：1平方公里的地区，一个城市，坐标图上1经度和1纬度间的面积和城市部门。

1平方公里土地。集聚指数预测值产生了与历史时间序列相似的模式：国家城市化进程早期阶段密度的迅速攀升（参见图1.7）。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 000美元之前，这种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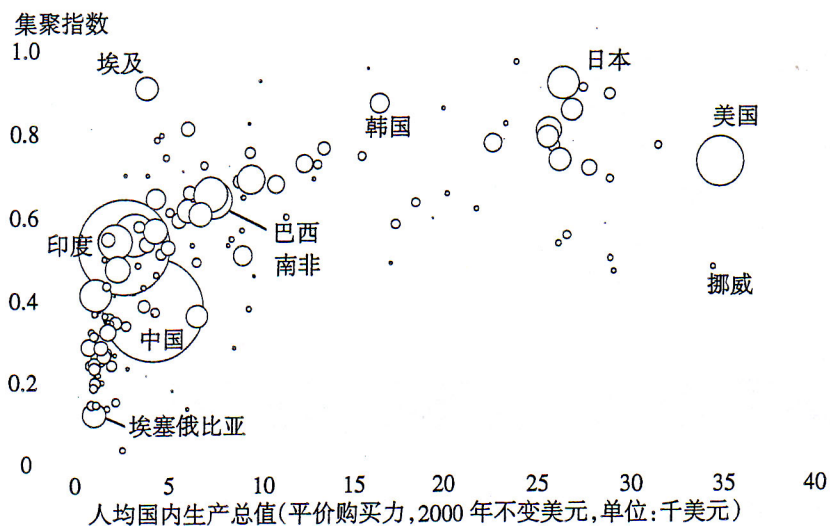
比例和发展之间强大的正相关关系持续有效。农村流入城市地区人数的剧增会对早期城市化进程产生影响。因此，当城市比例达到6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 0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进程会减缓，密度化倾向也趋平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 000美元的国家，其集聚指数超过70%。有几个国家例外，但即使这些国家（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挪威和瑞典），其集聚指数也常常超过50%。

行政区划。以单个城市为地理单位，一国的的发展水平与地位（即一国主要城市的人口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凹曲线关系，这也是文献广泛采用的集中化指标。正如集聚和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其地位会迅速上升，直到城市化进程晚期阶段才会稳定下来（参见图1.8，调查对象a）。人口和产出密度高度相关，但是人口密度低估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程度。密度发挥了集聚经济的作用，而集聚经济又促进了密度的提高。由于毗邻集中区，集聚经济给企业和工人带来利益，使得产出密度的增加量超过就业密度或人口密度的增加量。

1经度1纬度区域。采用地球坐标图区域测量集中程度，人们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5 000美元的国家，随着最密集区域产值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上升，经济板块的集聚密度迅速上升，然后在收入较高的国家趋向稳定并逐渐减弱（参见图1.8，调查对象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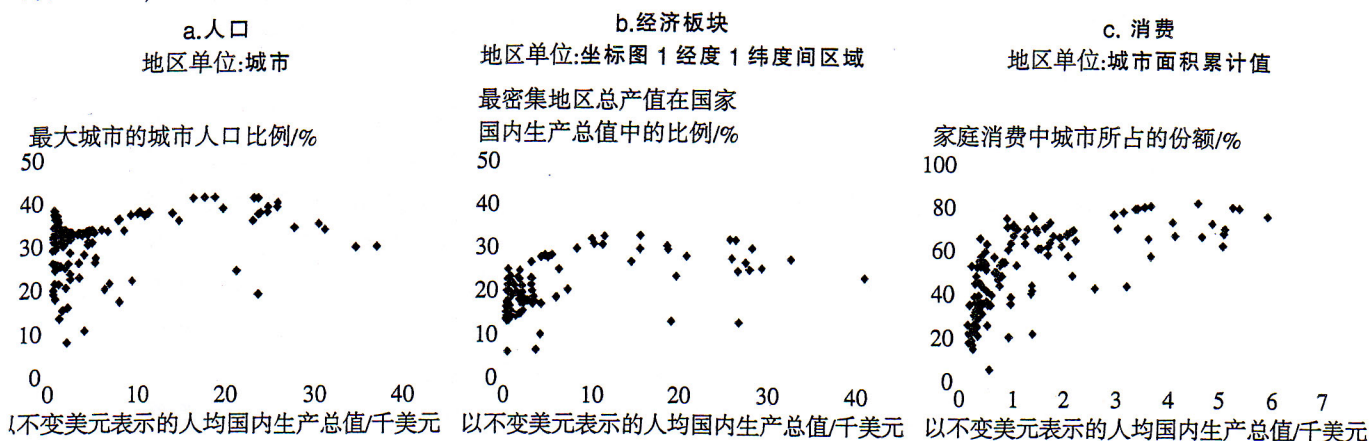
各国的城区面积。当前，人们使用消费指标而非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来测量集聚程度，这表明集聚和发展水平之间同样存在凹曲线关系。例如，马拉维和喀麦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50美元和750美元，而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则分别占全国居民消费总额的36%和48%。埃及和约

图1.7 生活在城市聚居区的人口比例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出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采用Nelson（2008）和世界银行（2006g）数据的计算结果。
注：圆圈的大小代表该国人口规模的大小。PPP = 平价购买力。集聚指数遵循下述标准：每平方公里密度为150人或更多，到达大城市的时间为60分钟或以下，居住人口超过50 000人。

图 1.8 人口、总产值和家庭消费的地理集中因发展而大幅度攀升，之后渐趋平缓
跨国家证据，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和 2000s



出处：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银行（2007j）、Nordhaus（2006）和 75 个以上国家（每个国家中，120 户家庭参与了调查）的家庭调查估测的数值。

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 1 600 美元左右，其城市居民消费所占的份额为 63%，而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3 500 美元和 7 500 美元的巴拿马和波兰来说，这个份额占到了 80%（见图 1.8c）。²⁶

面积较大、密度较高地区的组合

伴随着地理变迁这一既定事实，高收入国家大型居住区比例相当高，而小型居住区比例较低，对此，中等收入国家望尘莫及。而中等收入国家中等规模的居住区的比例则远远超过低收入国家。在低收入国家，3/4 的人口居住在人口不足 20 000 人的小型居住区，居住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型城市地区的人口仅有 10%。在高收入国家，情况恰恰相反（参见表 1.1），居住在人口不足 20 000 人的小型居住区人口比例不足 1/4，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超过 100 万的大型居住区。

在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一个小国或一个较大国家局部地区（例如某省，甚或某个大的区域）的地方组合，大致为 75% 的地区属于农村地区，5% 的地区属于城市地区，所有居住区的密度都较低。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工业化带动的农村-城市转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该地区或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朝 10 000 美元迈进，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平分秋色，居住人口大体相当。而在城市化更为发达的地区，即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内部转化的地区，人口分布可能为城市地区 75%，农村地区 25%。

这与美国的城市化历程极为相似。1690 年，北美殖民地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500 美元（1990 年国际美元）²⁷，其时，英国北美殖民地首要城市波士顿的人口为 7 000 人。根据当代标准，当时的波士顿略微大于小镇。在城市位序塔上，除波士顿外，只有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2 500 人，纽约和费城是其中两个。在美国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美国的城市比例

表 1.1 城市居住区的规模在发展中扩大

人口规模	%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小规模居住区：人口不足 20 000 人	73	55	22
中等规模居住区：人口在 20 000 人和 100 万人之间	16	25	26
大规模居住区：人口超过 100 万人	11	20	52

出处：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2007j。

从 1820 年的 7% 增至 1860 年的 2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 1 257 美元增至 2 170 美元（1990 年国际美元）。在此期间，主要城市，即现在纽约的人口从 123 706 人增至 805 651 人。借此东风，城市位序塔迅速扩张延伸。

1820 年，人口数量超过 100 万人的城市仅有纽约 1 个，而到 1860 年，则已增至 9 个。这些城市全都位于东北部，即工业化的发源地。随着地理变迁的结束，美国成功转型，跻身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体之列，系列样本城市（从人口超过 25 000 人的城市中抽取）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 7 230 人增至 8 876 人。城市的平均面积也从 19 平方英里增至 40 平方英里²⁸，与此同时，城市更加拥挤堵塞，不断延伸，布局愈加凌乱。

农村—城市和城市间趋同

国家不同地区生产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即“高低起伏”的地理经济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自然特征。这种波动性随着国家发展而日趋明显。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这将对贫困、消费和其他生活标准产生何种影响？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集聚过程中的政治和社会可持续性。

城乡社会福利不平等先是扩大，接着缩小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城乡的生产、工资和社会福利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国的经济板块迅速集中到城镇，城乡在生产、工资和基本福利方面的巨大不平等也随之凸显。资本、消费者和工人的集中迅速带来了生产优势，运输成本又限制了利益外溢。较大的市场为公司将固定成本转移到更多的消费者身上提供了可能，产生了成本和生产率优

势。²⁹ 这表明城镇工资水平较高，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更为齐全。

人口集中有助于更好地确保城市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保健服务的供应。这同时造成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和基本福利措施的更大差距。³⁰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缓和政府能力的提升，城乡不平等现象开始缩减。居民和工人从农村地区涌入城镇，这在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工人之间的竞争。而且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解放了劳动力，促进向城市移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终，投资和财政再分配将给乡村居民带来更好的基本福利，其中包括每日清洁的自来水、公共卫生、电力能源、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的确，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流逝，一国的经济地理将实现大致的自然平衡，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也将旗鼓相当。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将选择物质和非物质福利最称心如意的地区居住。伊斯兰伊朗共和国说明了这种城乡趋同（参见专栏 1.5）。

当代工业国家的证据显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城乡不平等。一系列指数表明，高城市比例和经济密度与城乡福利的细微差异并驾齐驱。2004 年之前加入欧盟的 15 个国家均把失业率作为政策的目标所在，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 13 000 美元（1990 年国际元）。³¹ 但是，城乡地区差异不是一个问题。城市地区的失业率为 10.1%，农村地区的失业率为 9.9%。表现在青年失业率上，亦是如此：城市地区为 19.4%，农村地区为 18.7%。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为 68.3% 和 69.4%。³² 在英国，城乡福利水平的高度平等还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农村每周可支配收入为 522 英镑，要比城市每周 476 英镑的可支配收入高出 10%。³³

专栏 1.5 伊朗的城市化和城乡不平等的缩减

伊朗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已经得到缓解。1976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乡村地区平均每人的家庭收入仅为城市地区的44%，而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增至63%。

政府将城市发展置于农村发展之上。基本粮食的价格控制压低了农业收入。高关税壁垒、进口限令和工业产品特许维护了制造品的价格，抑制了农民购买力。以最终国内需求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扩大了向德黑兰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国内移民。几项发展指数显示，中心地区发展成效显著，周边地区望尘莫及。1973年，中心地区的贫困率为23%，农村为42%。这种空间上的不平等点缀在伊朗的民族地区图上，成为紧张冲突的导火线。

1979年，政府承诺解决空间不平

等问题，进展如何呢？

- 首先，1979年至2005年期间，城市地区人口比例从49%增至67%。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趋势；1966—1976期间，城市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德黑兰的增长速度为6%）。

- 其次，家庭收入的城乡差距已经缩减。1976—1984年期间，农业增加值以31%的速度增长，这是非石油经济的2倍。出农场价增加了55%，这是实现增长的原因之一。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中小型农产的生产率，也促进了增长。此外，伊朗发生革命后，大型工业企业和服务企业实现了国有化，迟滞了效率的提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私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有助于增长。

- 再次，城乡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即使发展迟缓的省区亦不例外。

1976—1996年，女性识字率从17%增至62%，城市地区的女性识字率则从56%增至82%。1994—2000年，贫困省区的婴儿死亡率和5岁下儿童死亡率以最快的速度下降。

- 最后，整体贫困率下降了，2005年，国家贫困率为8.1%，城乡贫困率稍有差别，分别为7.1%和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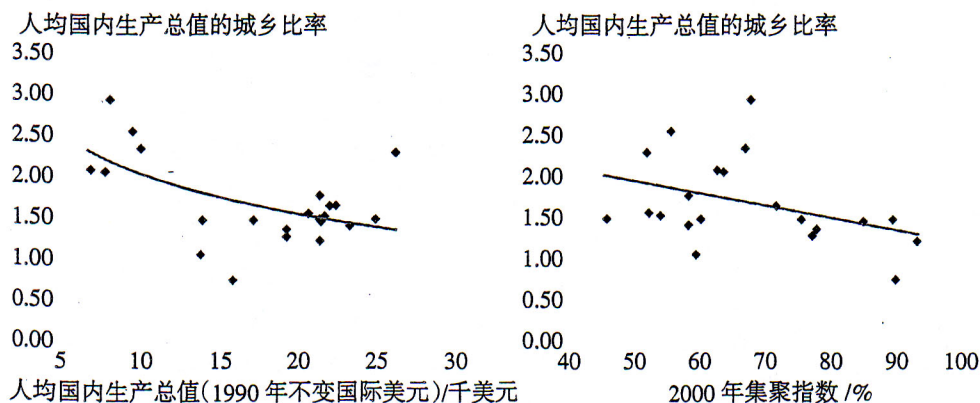
但是，各省贫困率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从1.4%到23.3%各不相同。过去30年中，实现地区平等的政治承诺产生了复杂的效果：整体贫困率下降，城乡生活水平趋同，然而，省区间生活水平的差异却顽固不退，经久不弥。

出处：基于 Dobronogov, Alexander Kremer 等人的文章。

2003年，对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的21个而言，³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就越低（参见图1.9）。³⁵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土耳其等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0 000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城市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高出2~3

倍。但那些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 000美元的经合组织国家，比率在1~2间波动（挪威例外）。考虑到经合组织国家完备的财政分配机制、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年龄-人口配备的差异，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可能夸大了城乡的地区差异，确切说，夸大了城乡个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异。集聚指数产生了相同的

图 1.9 较为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城乡不平等程度也较低



出处：2009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经合组织（2007）数据，pp. 1-256。

表 1.2 城乡收入、财富和消费不平等是既往两个世纪发展过程的特征

国家 (年度)	城乡不平等 (%)	特征描述和样本国家
瑞典 (1805)	221.0	城、乡地区每位成年男性占有的财富
芬兰 (1805)	146.0	城、乡地区每位成年男性占有的财富
英国 (1830s)	73.2	城市地区工资为建筑贸易领域劳动者的工资, 农村地区工资为农业劳动者的工资
法国 (1882)	29.0	城市地区工资为地方首府的无技能劳动工资, 农村地区工资为农场平均工资
(1911)	51.0	
美国 (1925)	28.07	城市地区工资为制造业工资, 农村工资为农业收入
(1935)	75.0	
发展中国家 (19 世纪)	51.2	城市地区为无技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 农村地区工资为农业工资, 包括实物工资。这类国家包括 1872 年的阿根廷, 1887 年的澳大利亚, 1872 年的丹麦, 1892 年的法国, 1864 年的匈牙利, 1887 年的日本, 1820—1829 年和 1890 年的美国
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41.4	城市地区工资基于无技能建筑工人的工资, 农村地区工资为农业现金工资。支持这一平均数据的国家有 19 个 (1960—1970), 分别为: 阿根廷、喀麦隆、智利、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危地马拉、肯尼亚、巴基斯坦、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巴拿马、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发展中国家 (21 世纪)	42.0	基于家庭特征加以对照的人均家庭消费水平。支持这一不平等平均数据的国家有 72 个 (2000—2005), 分别为: 美国、安哥拉、孟加拉国、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保加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 (金)、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科威特、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乌干达、乌克兰、越南和赞比亚

出处: 瑞典和芬兰 1805: Soltow 1989, 表格 1, p. 48; 英国 1830s: Williamson 和 Willi 1987, 表格 3, p. 652; 法国 1882, 1911: Sicsic 1992, 表格 2, p. 685; 美国 1925, 1935: Alston 和 Hatton 1991, 表格 3, p. 93; 发展中国家 (19 世纪): Clark 1957, 表格 II pp. 526—531; 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Squire 1981, 表格 30, p. 102; 发展中国家 (21 世纪): 2009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72 个国家家庭调查的估测值。

注: 名义上, 城乡不平等指城乡工资、收入、财富或消费差异与农村平均数的差值。

定性模式。

这些国家的城乡不平等现象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阶段。19 世纪, 瑞典城市地区每位成年男性的财富占有量要比农村地区高出 200%, 芬兰则要高出 150% (参见表 1.2)。19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城市扩张迅速, 这一时期, 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比农村地区高出 75%。1882—1911 年期间和 1925—1935 年期间, 法国和美国城市地区的工资大幅度增长。事实上, 美国的工资在 10 年间几乎增长了 3 倍。³⁶ 澳大利亚、丹麦、法国、日本和美国等 19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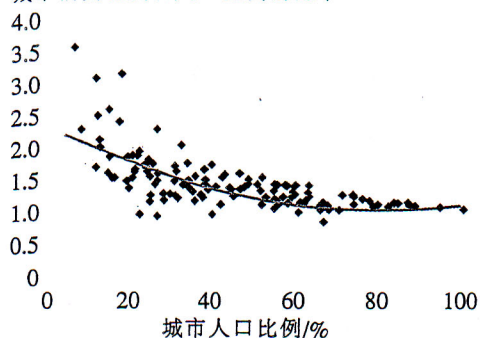
其城市地区的名义工资要高出 50% 左右。

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城乡生产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不足为奇。20 世纪 60 年代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其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比农村地区高 40%, 现在, 这些国家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近期, 对 72 个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发现, 这些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着类似的差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 城乡经

图 1.10 城市化的深入发展拉近了城乡人均消费水平的距离

城市消费比例和人口比例的比率



出处: 2009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的估测值, 该估测基于对 75 个以上国家 120 多户家庭的调查。

济板块和人口分布的差异将缩小。一国城市地区人口比例与该地区的消费之比, 是检测城乡消费不平等程度的另一条途径。如果该比率大于 1, 城市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要高于农村地区, 反之亦然。

在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 城乡消费水平的不平等程度随着密度的提高而下降 (参见图 1.10)³⁷。马拉维和斯里兰卡有两个比率: 城市人口比例超过 10%, 然而其消费比例却超过 20%。对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 人口与生产的空间分布极为相似。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的城市人口比例在 20%~25% 之间波动, 城市人口的消费比例约为 30%~35%。随着国家进入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 人口与经济会大致按比例分布, 因此, 该比率将接近 1。在智利, 85%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城市居民的消费比例约为全国总消费的 92%。在巴西, 80% 的居民居住在城市地区, 其消费比例为 85%。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到高密度区, 城乡不平等将逐渐消弭。关于不同层次城市化进程的下滑斜线是一个好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度过了城乡不平等的高峰期。³⁸

基础设施亦是如此。在城市人口

比例不足 25% 的低收入国家中, 城镇地区可享用的水资源和公共卫生服务约比农村地区高出 25% 左右。³⁹ 然而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言, 这一比率是 15%~20%。在城市化高度发达、城市化比例接近自然最大值的国家, 城乡在使用基本服务上基本上不存在差别。享用基础设施服务的平等机会可以促进福利和生活水平等非物质指标相应的趋同 (参见表 1.3)。

减少城乡不平等现象举足轻重, 而完全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农村地区的基本福利设施更是重于泰山, 刻不容缓。城乡不平等问题的恶化与城乡地区基本福利设施的完全改观并不冲突。这一论点已得到印证, 事实上, 所有的证据都令人振奋。既往 10 年中, 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基本服务都得到完全改善, 这体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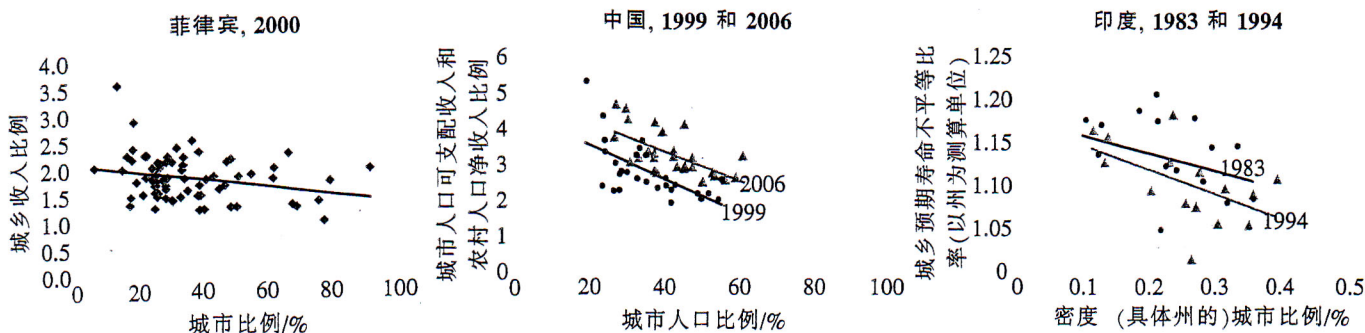
表 1.3 随着发展的深化, 城乡的基础服务差距将拉近

城市人口比例 (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纯净水使用的 不平等程度 (百分比)	公共卫生服务 的不平等程度 (百分比)	实例国家
75% 或更高 (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1 602 美元)	8	8	美国、挪威、瑞士、西班牙、德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巴西、阿根廷、加蓬、委内瑞拉、吉布提、黎巴嫩、约旦、英国
50% ~ 70% (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9 672 美元)	15	20	爱沙尼亚、巴拿马、土耳其、匈牙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叙利亚、阿塞拜疆、南非、刚果(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玻利维亚
25% 或更低 (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 585 美元)	24	26	印度、也门、马达加斯加、乍得、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坦桑尼亚、肯尼亚、尼泊尔、柬埔寨、马拉维、乌干达、斯里兰卡、不丹

出处: 世界银行 2007j。

注: 不平等程度指城乡地区的百分比差异。

图 1.11 即使在省区层次，城乡不平等现象也随着密度的提高而减少



出处: Balisacan, Hill 和 Piza 2007; Yao 将出版; Cali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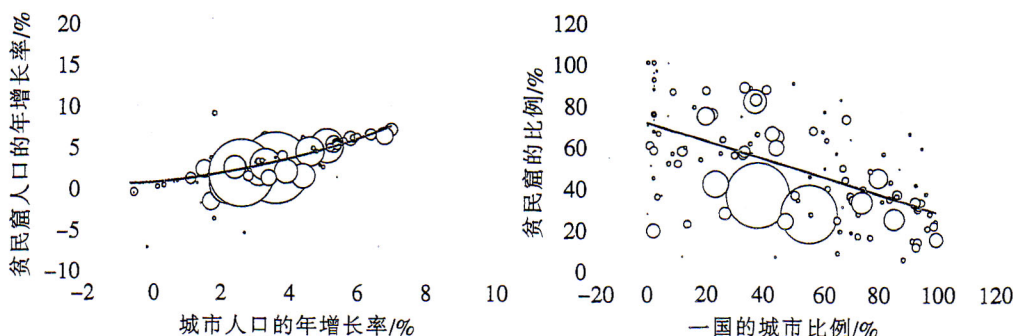
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营养不良问题、免疫力和城乡地区入学率等一系列指标上。在 32 个低收入国家中，3/4 的国家降低了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缩减了发育不良和体重过轻问题的存在范围，农村地区的成效尤为令人瞩目。⁴⁰ 而且自 1990 年以来，这些国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就学率增加了 4/5。⁴¹ 城市和农村地区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

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城乡趋同现象应运而生。在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城市化的省区内部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参见图 1.11）既往 10 年中，中国的总体关系向上发展，其城乡不平等现象也随之恶化，这与中国早期发展阶段城市的迅速扩张并行不悖，协调一致。1983 年和 1994 年，印度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区，城乡预期寿命的差距比较小。其总体关系呈下降趋势。

贫民窟：城市内部的分化和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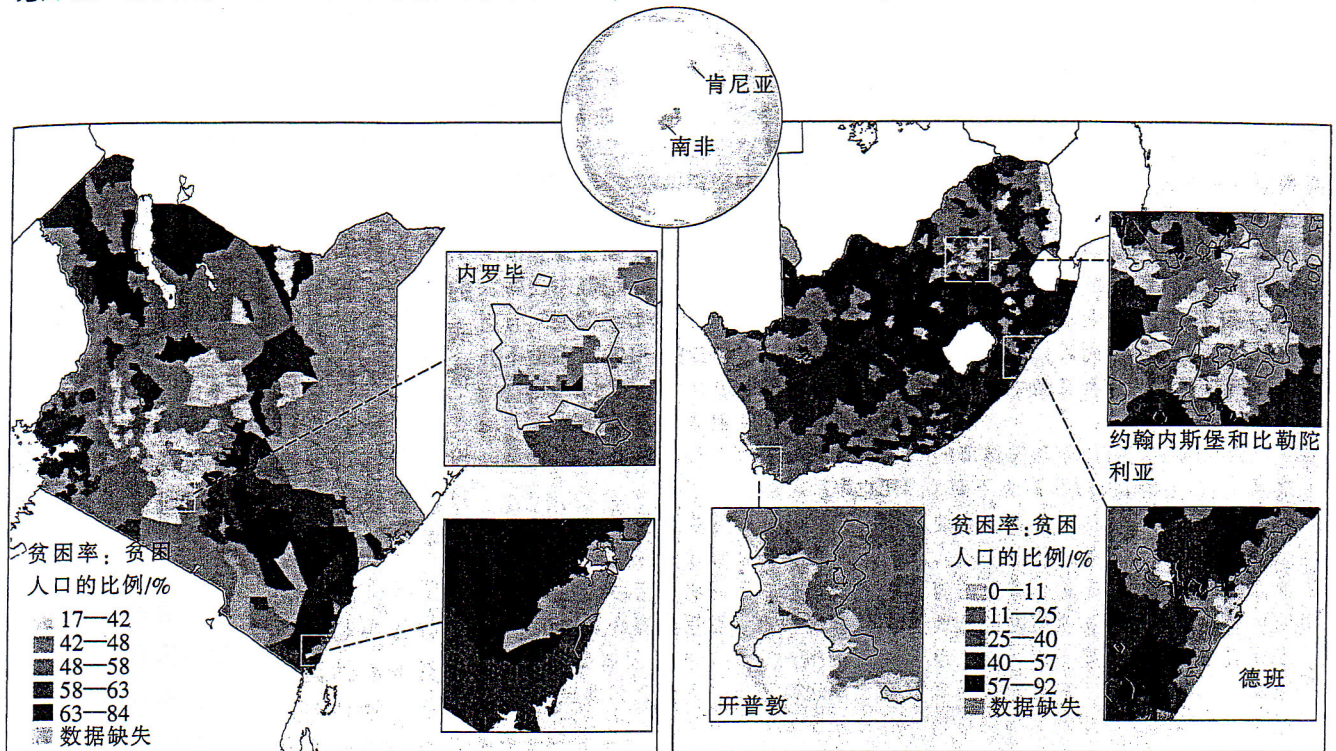
贫困国家城市里较高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彻底铲除贫困现象和绝望情绪。城市内部的地区不平等也可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内罗毕，内城的贫困率居高不下，其余城区和郊区却低了许多（参见图 11.2）。蒙巴萨是肯尼亚第二大人口城市，整体而言，其贫困现象比内罗毕严重，这里，贫困的地区划分界线分明，不容抹杀（参见地图 1.2）。南非的城市也存在内部趋于贫困率不等的现象。开普敦沿海区域贫困率不高，而内城的贫困率则较高。无独有偶，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茨瓦内和德班等城市均存在贫困现象的地理界线。德班的地理贫困现象与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外贫困率高于城内贫困率。城市内部贫困地理划分最显眼的标志就是贫民窟。

图 1.12 贫民窟扩张与城市化进程同步进行，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缓慢而减少



出处: Kilroy 2008。

地图 1.2 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不平等地位可能非常严重（根据贫困程度进行的划分）



出处：全球贫困测绘项目，哥伦比亚大学，使用 Alderman 等（2002）人的数据，南非统计局，肯尼亚中央统计局和肯尼亚规划和国家发展部。

在服务水平严重不足的居住区域，贫民窟比比皆是，而且长期盘踞在那里不肯销声匿迹（参见专栏 1.6）。鉴于贫民窟的不规范性和非法性，许多城市的市政府、公用事业单位和服务供应者无力或不愿为贫民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应，这导致了这些地区公共服务的匮乏与落后。⁴²因此，贫民窟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医疗健康、安全和公共卫生，难以和附近的规范居住区相提并论。孟买的达拉维号称亚洲最大的贫民窟，非正式证据显示“可能有 100 万居民挤塞在由木头、混凝土和锈迹斑斑的铁柱构建的低矮的房屋中……一家十二口人挤在 90 平方英尺的房间里”。也是在孟买，Shiva Shakti Nagar 社区的一个公用水龙头大约由 100 个人共同使用。⁴³

主要城市贫民窟的肆虐蔓延是迅速城市化造成的结果。由于无力妥善安置迅速增加的人口，贫民窟和棚户区日益扩张，更加触目惊心。这拉大

了城市内部福利分配的地理界线。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时进行重点干预，最终推进了城市地区生活水平的趋同。

贫民窟与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密切联系。约 1/5 到 1/3 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参见图 1.12）。⁴⁴1950 年，巴西戈亚斯州首府戈亚尼亚仍是一个只有 4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而今天，它的人口超过了 100 万，相当部分的新增人口居住在贫民窟。⁴⁵1950 年以来，德里的人口从 140 万人增长到 1 560 万人，增加了 10 倍还多，⁴⁶贫民窟集聚区的数量也从 200 个增加到 1 160 个。

“他从未见过如此肮脏或糟糕的地方。狭窄泥泞的街道，臭味熏天的空气……满路粪便、这里或那里岔入主街的小径或院子，醉酒的男男女女在里面纵情欢乐的虚掩的、污秽的房屋”。这是对当代内罗毕的 Kibera 或 Huruma，阿比让的 Washington，德里

专栏 1.6 过去和现在的贫民窟

“贫民窟”可能源于一个古老的英语或德语单词，其意思是排水很差的地方或肮脏的地方，后被用于特指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居住区。其时，铁路运输尚未出现，大量的货物通过运河运往全国各地。英国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大多数工厂设在运河附近，以便于运输蒸汽机所需的煤和其他生产投资物品。

为寻求工厂工作而移民城市的贫困工人，无暇长途步行上下班。而在电动汽车运输盛行之前，其他运输方式又非常昂贵。因此，工人的居住地方离工厂不远。廉价的房屋也就在工厂附近排水很差的低地发展起来。房屋拥挤不堪，卫生设施匮乏，事实上，大多数地区根本没有卫生设施。煤烟和其他污染物弥漫在空气中，致使空气污浊不堪。疾病简直是家常便饭，腹泻、斑疹伤寒、呼吸道疾病、麻疹和猩红热降低了城市人口的预期寿命，实际上，乡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比城市人口长 12 年。

英国城市地区贫民窟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灾难最终殃及工人阶级以外的居民，造成了人口死亡惨重

的悲剧，激发了强有力的政治行动。然而，政府没有组织工人的继续移民，亦没有清理这些充斥着疾病和贫困的地区。19 世纪 70 年代，政府颁布了严格的建筑管理法律，规定街道和房屋的大小和规模，并强制规定一切居所必需和新建的排水系统连接起来。1894—1907 年期间，主要城市对水工厂、污水处理设施、公共卫生健康的投资成效显著，大幅度降低了英国城市地区的死亡率。

在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数百万居民为抓住城市地区层出不穷的经济机会，不顾脏臭污秽的恶劣条件移民城市。尽管非洲许多城市地区的棚户区健康灾难肆虐蔓延，死亡率居高不下，人们仍在那里工作或从事贸易，并将大额款项汇往家里。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和维多利亚时代伦敦需要解决的问题差可比拟：如何改善这些聚集区的交通运输状况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从而抓住经济增长的利益。

出处：Satterthwaite 等 2007；Crafts 2008；经济学者 2007a。

的 Majboor Nagar 或 Kanchan Puri，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圣费尔南多，或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等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真实描写？错了，这是查尔斯·狄更斯 1838 年出版的《雾都孤儿》中的一段，描写的是 19 世纪迅速扩张的伦敦。

伦敦绝不是 19 世纪英国唯一的一个拥有大型贫民窟居住区的城市或城市地区。拥挤堵塞、房屋供应不足是当时英国城市或者工业化城镇普遍存在的顽疾。在爱丁堡，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新兴中产阶级向市郊搬迁的第一次浪潮意味着到 19 世纪 60 年代，城市中心地区密度高达每英亩 600 人的贫民窟已经规模不小。沿着狭窄、黑

暗的街道林立的多层经济公寓，就是居民的住所。倘使洁净水和安全污水处理系统能够称得上福利设施，那么，无论是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环境设施上，居住的状况都严重不足，糟糕透顶。⁴⁷抛开惨不忍睹的表面现象不提，贫民窟经常遭受麻疹和猩红热的袭击，腹泻、斑疹伤寒和呼吸道疾病又造成了高死亡率，这使贫民窟常常爆发致命性的打击。⁴⁸

昔日的贫民窟已经发展为当今的世界级城市。在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经历贫民窟和城市内部福利水平分化这些问题的煎熬，英国只是其中一个国家而已（参见专栏 1.7）。先分化再趋同，这一典型模式也是当代其他发达国家的特征。对这些城市而言，贫民窟已经时过境迁，成为历史。土地市场的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和针对性激励措施的实施携手合作，降低了福利不平等的程度，然而，这只有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确，在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东京等世界级大城市，得益于事后认识，贫民窟被视为“增长中的痛苦”。短短一个世纪中，英国的黑脏磨房一扫而净，如果英国提前开始清除工作，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遭受工资增长缓慢、消费水平迟滞不前的困扰。⁴⁹在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发展促进了城市内部生活水平的趋同，贫民窟也随之缩小。

一个国家早期和中期发展阶段贫民窟的出现和扩张可以用功能性劳动力市场和功能失灵土地市场的相互作用予以解释。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劳动力市场信号显示城市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较高，这是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结果。劳动力对此的反应是涌入城镇。

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居民常常抓住城市提供的经济机会，参与生产活动。孟买的达拉维有 15 000 家“棚

专栏 1.7 许多世界级城市都曾经受到贫民窟的困扰

“在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大多数城镇，工人阶级居住房屋的基本问题是……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或单独的水供应设施……19世纪三次严重的霍乱瘟疫在这里猖獗肆虐，大行其道……”

“巴尔的摩贫困人口的第一个居住地在滨水。黄热病、疟疾、霍乱和伤寒一次又一次爆发并席卷全镇。奇怪的是，这些瘟疫似乎与居住在低地的贫困人口大有干系。例如，据说1797年的黄热病肇始于水流不畅的费斯浦湾并迅速蔓延……蔓延到 Jones Falls 沿岸的棚屋和茅舍，然后又感染到 Federal 山脚下的棚屋和茅舍。”

“到19世纪80年代，波兰移民取代了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创建了新的贫民区。每栋房屋容纳六到八户家庭，每个家庭拥有一个房间。院子里的水龙头供应用水，户外厕所发挥着盥洗间的作用。卫生官员将费斯浦形容为奥吉厄斯牛舍……一片污秽……露天臭水沟，满是野草的空地，烟灰和垃圾成堆的小巷，脏水流溢的小巢、难得清洗的房屋、几个月不能洗澡的居民……这简直是猪舍。”

“都柏林贫民窟是欧洲最糟糕的地方之一，仅次于格拉斯哥。高大的城镇房屋，18世纪为富裕阶级建造的精致的住房，落入贪婪、缺乏人性的房屋出租者之手，那些穷困潦倒、濒于绝望的贫困人口几乎要把房子挤爆。这里条件恶劣，拥挤堵塞，卫生设施极度匮乏，难于尽述。”

“卡达亚诺加从低收入者住宅区转变为优秀公务人员和资产者独享的住宅区，这是赫尔辛基史无前例的城市增长模式。先前的贫民窟成为备受瞩目的特权阶层的高档住宅区。”

“这里有贫困人口的坟场，利物浦车站和利兹铁路，后面是工厂——曼彻斯特的‘济贫巴士底狱’，俯瞰着下方工人阶级的生活区，不无威胁。沿着崎岖不平的河岸，穿过河流冲击区，就可

以到达这些小小的、只有一个房间的一层棚屋。大多数棚屋没有精致的地板，厨房、起居室和卧室混为一谈。在这样一个面积几乎不足5英尺x6英尺的狭小阴暗肮脏的房间里，我发现了两张床，这样的床架，这样的床，实在糟透了。而且，楼梯和烟囱居然在房间里。另外几个房间几乎什么都没有，门敞开着，居民斜倚在门口。门前处处是垃圾和废物，这里那里，人们根本看不到路，只能用脚去触摸找路。”

“小布洛克街是墨尔本声名最为狼藉的贫民窟……到19世纪90年代……拥挤、喧闹并进一步扩张……种种腌臢物，如垃圾、腐臭液体、秸秆废料和其他垃圾，在小巷横行霸道。腐臭的气息从这些令人掩鼻的脏物上散发出来……恶心的东西……堆在外面任其腐化，扩散传染性病菌。”

“200年以前，曼哈顿低地地区有个面积约5英亩的湖，水光潋滟，美不胜收。湖的名字叫做 Collect……遗憾的是，到18世纪中叶，湖的周围布满了屠宰场和制革厂。企业的血样废弃物直接排入湖中，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垃圾也纷至沓来。到1800年，该湖蜕变成了臭气熏天的污水池。1813年湖被填平了，1825年，根本的变化发生了，费斯浦，美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窟矗立在这里。”

“尽管现在这里是巴黎非常昂贵的居住区，然而在维克多·雨果时代，这里是毗邻巴士底狱的贫民窟。”

“Derville 律师冒险进入 Saint Marceau 的贫民窟，巴黎城郊最贫困的地方。他的马车驶过污臭的、车痕斑斑的小巷，来到一幢房屋前，房屋全部由二手材料建成，施工质量也很糟糕，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和 Chabert 少校住在一起的是牛、羊、兔子和 Vergniaud 家。Vergniaud 曾经是个士兵，现在为人送奶，一贫如洗。少校住在一个地板肮脏的单人房间里，里面一张稻草床。

一个烟斗、一部《大军团公报》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了。”

“1815年至1851年法国人口从2900万人增长到3600万人……城市吸纳了那些在农村地区找不到工作的移民……然而工作总是不够。失业和过度挤塞造成这里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只有1/5的家庭可以使用自来水。1832年，一场霍乱夺走了大概2万巴黎人的生命。”

“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战后法国经历了房屋短缺问题的长期困扰。在按计划需要清除的17个贫民窟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原封没动。”

“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糟糕，像放羊一样将工人驱赶到工厂区域腐臭的贫民窟……如此腐臭、如此恶心……那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一排一排房子之间的通道简直就是露天的公共厕所。这里的拥挤堵塞让人痛苦。由于环境脏臭和不注意身体保护，许多在这里长大的孩子遍体是疮。”

“从1930年到战争结束的15年间，新加坡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00万人口。人口激增造成了住房紧缺问题。一个小商店可以为100人提供住宿。平均居住面积为9英尺x9英尺，和单人牢房的大小差不多。”

“20世纪20年代东京的贫民窟是东京城市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物……这些贫民窟的绝对规模震撼人心……二战结束后，贫困区再次涌现在东京的所有地区，甚至东京的老城区都未能例外。”

出处：比利时：Lis；巴尔的摩：Garrett 2002；都柏林：Kearns 2006；赫尔辛基：Mäkinen；曼彻斯特：Engels 1987；墨尔本：Mountford；曼哈顿：Baker 2001；巴黎：Sanderson, Villon 2000, 《经济学人》；上海：Schwenning 1927；新加坡：Baker 1999；东京：Koji 1969。

户”工厂，其居民生产的“服装、锅、玩具以及材料回收每年为工厂带来数百万美元收入”。1976年，州政府赋予棚户区部分权力，并为部分居住区提供水资源和能源供应，之后，许多贫民窟居民启动了自己的生意。达拉维夹在两条铁路主线之间，周边有6个车站，还是达拉维的交通枢纽。⁵⁰简言之，随着低收入家庭抓住就业空间集中带来的机会和企业抓住土地受限状况下地理位置的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也就乘机兴起。放慢、停止和逆转城市化进程并不符合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要求。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市场失灵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扭曲劳动力市场以应对城市土地市场的失败，可能给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考虑到密度和集中的优势所在，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和理性市场行为者的反应。然而，在保持房屋建设合法用地供应满足需求这一方面，低效的土地市场只能产生有限的、被动的效果，而误导性的城市规划是导致土地市场低效的罪魁祸首⁵¹。

当今发展者的独特之处何在？

19世纪初期，今天欧洲发达国家1/10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达到5000人或以上的城市区域。⁵²就这点而论，此前5个世纪的变化微不足道。因此，此后的城市化进程旗帜鲜明地告别了过去。

城市化的进程和模式大同小异

城市化进程发轫于英国。1800年，英国的城市比例为19.2%，是欧洲平均水平的2倍。但在19世纪的前20年，城市地区人口翻了一番。截至1820年，英国的城市比例增至40%。19世纪末，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

区。欧洲其他早期工业化国家急急效法英国，推进城市化进程，希望能够迎头赶上。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运动从旧世界推进到美国和加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40%的美国公民居住在人口达到或超过5000人以上的城市地区，而6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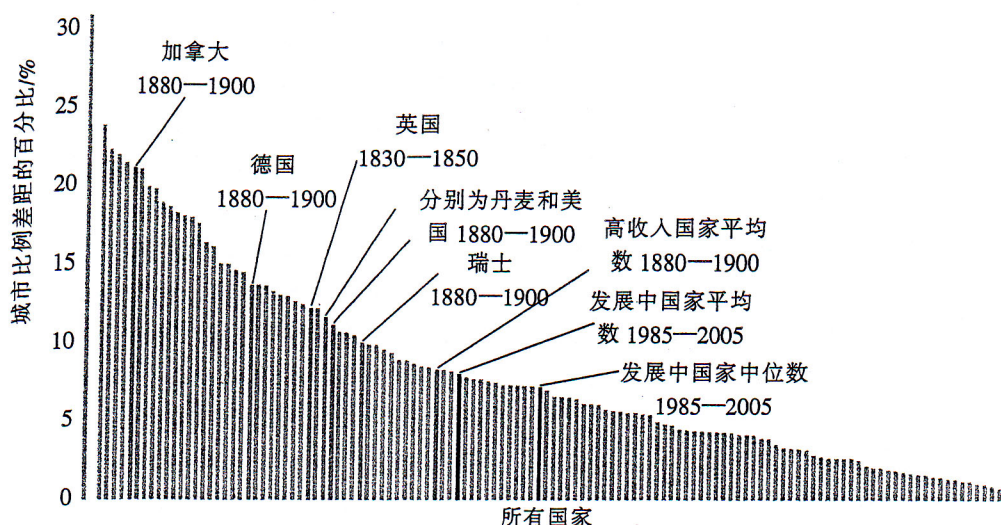
因此，倘使今天的发展者有所创新，这绝对不会体现在城市化的速度上。的确，1985—200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速度与1880—1900年期间欧洲和北美国家的速度极其相似（参见图1.13）^{53, 54}。早期发展者20年期间城市比例的绝对增长率为7.7%，而当代发展者的相对中位数和绝对数分别为7.1%和8.0%。大多数早期发展者19世纪末20年的城市化速度都能与当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前四位国家相媲美。

当今发展者城市化的规模更大

那么，差别在哪里？其一是最近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史无前例地绝对增长。较之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工业化国家，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更大。据估测，今天的城市人口为33亿，远远超过1960年的世界总人口。经历了1万年的时间，城市人口才于1960年达到10亿，此后，短短25年，城市人口增加了10亿，接着，仅仅18年的时间，城市人口又增加了10亿。⁵⁵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城市人口再次增加10亿仅需15年的时间。⁵⁶未来25年中，单是东亚就有5亿人口加入今天7.5亿的城市人口中，基本上等于每月新增了一个巴黎或吉隆坡。

1985—2005年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25亿，几乎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比例的绝对增长仅名列十五。印度

图 1.13 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前例
35



出处: 2009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 (2006c) 数据的计算结果。加拿大、英国的历史数据和工业国家的平均数据摘自 Bairoch 和 Goertz (1986) 和 Dumke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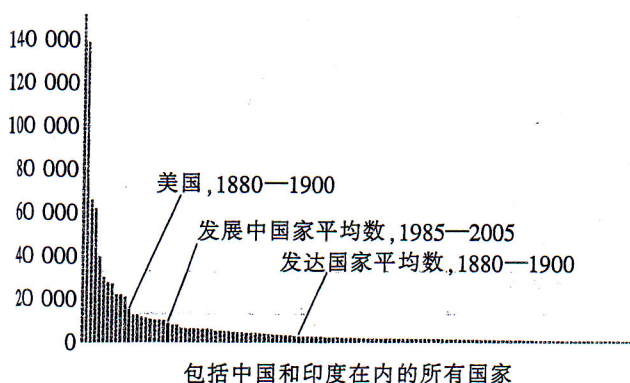
的城镇人口增加了 1.378 亿, 短短的 20 年内, 其城市地区塞进了相当于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口。

1985—2005 年期间, 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的平均数为 830 万, 这几乎是当今欧洲和北美高收入国家 1880—1900 年期间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 3 倍。然而, 如果将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外, 近几十年城市人口增长的平均数仅为 440 万, 这一速度超过早期发展者 50% (参见图 1.14)。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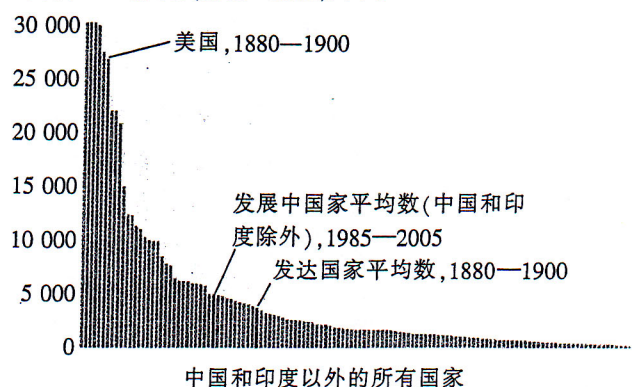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规模空前,

这构成了与早期发展者的另一个重大差别。19 世纪, 伦敦始终是世界最大的城市。1900 年, 伦敦的人口数量是 660 万人, 这仅仅是当代低收入国家最大城市 (如孟买和新德里) 人口数量的 1/3。1900 年伦敦, 甚至当代伦敦, 其规模难以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最大城市——当代上海 (人口为 1 000 万人) 匹敌, 也无力与开罗、雅加达和马尼拉等几个成功的发展者抗衡。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最大城市墨西哥市的人口高达 2 200 万人, 大约是

图 1.14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城市人口的变化(1985—2005)/千人



城市人口的变化(1985—2005)/千人



出处: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 (2006c) 有关 1985—2005 年期间的数据, 基于 Bairoch 和 Goertz (1986) 著述的历史数据计算。

20 世纪初期伦敦规模的 3 倍。

城市居民在个人收入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双赢

无论以收入指标衡量还是非收入指标衡量，城市的福利水平都优于农村地区。2000 年，马拉维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为每 1 000 名新生儿中有 117 例死亡，而在城市地区，死亡婴儿为 83 例。在降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减少疟疾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发病率上，贝宁城市地区取得的成果令农村地区望尘莫及。⁵⁸ 乌干达城市地区妇女较少遭遇贫血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城市地区健康指标较高，这几乎发生在发展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乍得和喀麦隆，到南亚的尼泊尔，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再到北非和中东的摩洛哥和埃及，无一例外。⁵⁹

然而，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发展者却背道而驰。城市居民享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他们和子女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寿命较短。1881—1891 年期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出生的人口预期寿命为 51 岁，但在伦敦出生的人口的预期寿命为 44 岁，在大城镇出生的人口的预期寿命仅为 39 岁。⁶⁰ 19 世纪 50 年代，人口规模超过 10 万的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为每 1 000 人死亡 196 例，远远超过农村地区的每 1 000 人死亡 138 例。⁶¹

直到 1937 年，乔治·奥威尔仍然认为，工业城镇是一个“你总是感觉烟雾和灰尘会永远肆虐，地球的任何地方都不能摆脱它们”的地方，这个评价恰如其分。⁶² 那么，由于没有城市恶劣空气质量造成的呼吸道疾病的困扰，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预期寿命会高出 4.7 年这一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如果没有霍乱、腹泻、痢疾和斑疹伤寒的困扰，预期寿命可能

会增加 1.7 年，没有麻疹和猩红热等城市常见疾病的困扰，预期寿命可能会再增加 2.3 年。⁶³ 这样，19 世纪 30 年代，尽管伦敦工人取得相当于其实际工资 67% 的城市补贴费，但其补贴的大部分是对城市生活健康灾难的补偿。⁶⁴

19 世纪下半期，德国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为每 1 000 新生儿 150 例死亡。德意志帝国时代，迅速扩张的柏林婴儿死亡率最高，19 世纪 60 年代，每 1 000 新生儿中，300 名左右婴儿夭折，到 70 年代，死亡人数达到 410 人，臻至顶峰。实际上，城乡物质福利的差距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⁶⁵

20 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在高密度地区的居民受到了传染性和寄生性疾病的侵袭。1880 年，城市地区（成人）死亡率比农村地区高出 50%；20 年后，城市地区的死亡率仍然高出 18%。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城乡差距更是令人触目惊心。1890 年和 1900 年，城市婴儿死亡率分别高出农村 63% 和 49%，城市 1~4 岁儿童死亡率则分别高出农村 107% 和 97%。1900 年，城市地区男性预期寿命比农村地区男性少 10 年。⁶⁶

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健康指标优于农村地区，而发达国家在同等收入水平的 19 世纪却遭遇了相反的经历，这反映了健康医药水平的进步，反映了污水治理和供水系统的改善。而且，它还反映了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对公共福利的贡献。这样，高密度的优势并不局限于收入生产和财富创造，它还延伸到社会领域。

理解了福利私人 and 公共来源的不同，对发展中世界城镇如此迅速的增长，人们就很难啧啧称奇了。密度的提升还不够快，这才是令人惊诧的事情。这其中有何政策暗示？任何期望减少风险和确保慎重的城市化战略都必须努力改善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